内部发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研讨实录

第 108 期

108

2018 SDRF——PIIE 中美经济研讨会

SDRF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八年六月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802室
邮编：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Address：Rm 802,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ZipCode：200023
Tel：86-21-62188752
Fax：86-21-62188714
WebSite：www.sdrf.org.cn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成为了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2009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再思考》、《名家谈中国经济未来》。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编者的话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SDRF）和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于 5 月 16 日举办了“2018 SDRF——PIIE 中美经济研讨会”。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郑杨在主旨演讲“上海的金融开放”中介绍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表示上海将继续推出更多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项目。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先生发布了基金会的最新研究报告《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与防范》。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Nicholas Lardy，原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美国彼得森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高级研究员 Robert Lawrence，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明棋，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等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和防范”两个专题进行发言和讨论。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

目 录

会议议程.....1

开幕式.....3

主办方致辞.....3

主旨演讲.....5
郑杨：上海的金融开放.....5
回答提问.....9

第一节：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可能的后果及影响.....12
徐明棋：美中贸易失衡问题及其再平衡的路径.....12
Robert Lawrence：中美贸易摩擦.....17
邵宇：逃逸三重修昔底德陷阱.....22
Mary Lovely：海外对华高科技产业投资.....26
讨论.....32

第二节：海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识别和防范.....40
乔依德：基金会研究报告发布
——《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与防范》40
何知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风险及其政策含义.....41
Nicholas Lardy：海外直接投资的风险.....44
王晓东：绿地海外投资的目的、进展和遇到的问题.....46
Nicolas Veron：欧洲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看法.....51
讨论.....54

闭幕式.....60
Nicholas Lardy：闭幕致辞.....60
乔依德：闭幕致辞.....60

会议议程

时间	内容
08:30-09:00	**签到**
09:00-09:05	**致辞** **胡延照**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会长，原上海市副市长 **Nicholas Lardy**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09:05-09:20	**主旨演讲** 演讲嘉宾：**郑杨**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 演讲题目：**“上海的金融开放”** 主持人：**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09:20-10:40	**第一节：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可能的后果及影响** 主持人：**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09:20-09:30	演讲嘉宾：**徐明棋**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演讲题目：**“美中贸易失衡问题及其再平衡的路径”**
09:30-09:40	演讲嘉宾：**Robert Lawrence** 特约高级研究员，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原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演讲题目：**“中美贸易摩擦”**
09:40-09:50	演讲嘉宾：**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演讲题目：**“逃逸三重修昔底德陷阱”**
09:50-10:00	演讲嘉宾：**Mary Lovely** 特约高级研究员，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演讲题目：**“海外对华高科技产业投资”**
10:00-10:40	讨论
10:40-12:05	**第二节：海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识别和防范** 主持人：**Martin Chorzempa**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时间	内容
10:40-10:45	演讲嘉宾：**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演讲题目：**“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报告发布：《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与防范》”**
10:45-10:55	演讲嘉宾：**何知仁**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演讲题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风险及其政策含义”**
10:55-11:05	演讲嘉宾：**Nicholas Lardy**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演讲题目：**“海外直接投资的风险”**
11:05-11:15	演讲嘉宾：**王晓东**　绿地集团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 演讲题目：**“我们海外投资的目的、进展和遇到的问题”**
11:15-11:25	演讲嘉宾：**Nicolas Veron**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演讲题目：**“欧洲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看法”**
11:25-12:05	讨论
12:05-12:10	**闭幕致辞** **Nicholas Lardy**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开幕式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的“2018 中美经济研讨会”现在开始！首先让我们欢迎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会长、上海市原副市长胡延照先生代表主办方之一的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致辞。

主办方致辞

胡延照（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会长，原上海市副市长）：尊敬的尼古拉斯 · 拉迪先生，尊敬的郑杨先生，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热烈欢迎各位参加由本基金会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018 中美经济研讨会”。我谨代表主办方之一的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向参加本次会议的各位贵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当前全球经济逐渐复苏，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经贸纷争加剧。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其后果不仅会影响到中美两国人民、两国企业，还会波及到全球。在这种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如何预防这些风险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挑战。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代表团刚刚从北京来，他们

在那里会见了决策者，现在又到中国经济、金融中心上海来。我们特地邀请了企业界和市场人士参会，以便各方面观点都能得到充分表达和讨论。

另外，下午我们还安排美国的朋友访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希望他们看看市场的实际操作，也希望对他们的研究有所帮助。

最后，我衷心祝愿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的成功，衷心希望美国的朋友在上海逗留期间生活愉快。谢谢！

乔依德：非常感谢胡延照会长的欢迎辞，下面有请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致辞，让我们热烈欢迎！

Nicholas Lardy（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非常感谢乔依德先生给我们做的介绍，也非常感谢胡市长给我们做的开幕致辞。我来自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感谢上海发展研究院基金会组织这次的会议，我们也非常期待在这次会议上跟大家做进一步的探讨。在过去 5 天中，我们在北京学到了很多，相信我们在上海也会有很多的收获。

我们这次的会议主要会专注于中美之间的贸易，这是今天早上第一个环节的主要话题，第二个话题会讲到对外直接投资，讲到中美双边经贸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我非常感谢这次会议的主办方，而且也非常期待我们这次的会议有非常好的讨论，谢谢大家！

乔依德：感谢拉迪先生的欢迎辞，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郑杨先生。下面有请郑杨先生为我们做今天的主旨演讲，题目是“上海的金融开放”，大家热烈欢迎！

主旨演讲

郑杨：上海的金融开放

郑杨（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尊敬的胡延照会长、乔依德副会长，各位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和专家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今天来参加“2018 中美经济研讨会”。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成为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5 月 3 号至 4 号，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努钦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就共同关心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双方认为，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十分重要，并就部分的问题达成了共识。5 月 15 号至 19 号，应美国政府的邀请，刘鹤副总理赴美访问，就两国的经贸问题再次磋商。在此背景下，今天召开研讨会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根据本次研讨会的安排，我向各位介绍一下上海金融开放的情况，以及下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初步打算。

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会上进行了主旨演讲，深刻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宣布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包括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也让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焕发出新的活力和勃勃生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一项重

大的国家战略，本身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因改革而生，因开放而兴。

在 1991 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视察上海时就指出："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上海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我国的第一支股票、第一支 B 股、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第一批外资法人银行都诞生在上海。

近年来，在中央政府坚强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上海积极开展金融改革创新开放的先行先试，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自 2017 年以来，上海已经连续两次在伦敦智库编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FCI 的排名中名列第 6 位。

有五个方面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

一是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的城市之一，上海集聚了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外汇等各类全国性的金融要素市场。2017 年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达到了 1400 万亿元，全国直接融资总额中的 85% 以上来自上海金融市场。

二是上海已经成为中外资金融机构的重要集聚地，各类国际性、总部性、功能性的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不断涌现。截至 2017 年末，在沪持牌机构达到了 1537 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的占比达到了 30%；上海的外资法人银行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外资保险公司均占内地的一半左右。原油期货等相继启动，一系列的试点顺利推出。

三是银行间的外汇、证券、货币等市场加快开放。

四是上海已经成为内地金融改革创新的先行区，我们主

动对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上海自贸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等国家战略，在跨界人民币业务等方面在全国率先试点，成为我国金融产品和业务种类最为丰富和最为集中的城市。

五是上海已经成为内地金融发展环境最佳的地区之一。上海法治环境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全国我们将率先成立上海金融法院，信用体系、人才服务、金融专业机构和服务体系也不断健全，金融机构的地区规划与建设成效明显。

开放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最大优势，我们将按照中央的要求，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推进金融领域全方位、高水平的开放，当好新时代金融的排头兵和先行者。

当前，我们要做四项工作。

一是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与创新。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对照中国人民银行易纲行长宣布的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我们近期要在六个方面争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先行先试，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拓展 FT 帐户的功能和使用范围，以及放开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上海金融业开放的第一批 8 个项目已经推出，下一步将继续推出更多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项目，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地区和业务类别，不断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对外开放的水平，同时将加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自贸区建设的联动，积极争取国家把新的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新型科技等放在上海先行先试，进一步提升投融资功能，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试点，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二是要进一步提升上海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发展全球新的金融市场，引进国际知名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扩大引入境外长期资金参与上海证券市场，扩大境外主体发行熊猫债的规模，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在岸商品中心，逐步形成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集聚发展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机构，汇聚全球的资源来支持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是我们要进一步建设面向“一带一路”国家投融资中心。完善“一带一路”的投融资服务体系，使上海成为“一带一路”全球的金融服务桥头堡，继续支持境外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债券和其他证券，支持在沪的金融市场与沿线国家交易所开展合作，集聚服务金融建设的相关金融机构。

四是我们要进一步做好金融风险的防控工作。对上海来说，没有金融安全就没有金融创新改革，也不可能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上海将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加强金融形势跟踪分析，继续推动综合监管试点，促进行业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更好形成金融开放创新与金融风险防范的良性互动。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大变革、大调整，人类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机遇与挑战并存。上海的经济发展前景很美好，上海金融业改革开放任重道远，我们将不断学习借鉴全球的经验，更好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今天我先介绍到这里，希望在座各位中美专家充分交流，献言献策，进一步碰撞出中西思维交融的美丽火花，恭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郑主任的演讲，他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了上海当前金融开放的状况，大家也能从媒体上了解到上海要在六个方面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扩大对外开放

既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所要求的，也是国家战略、国家领导人所要求的，同时也是中美在解决当前贸易摩擦中，中方所做的一个有效举措。接下来，在座各位如果对上海的金融开放有疑问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提一两个问题，请大家抓紧时间。

回答提问

Nicholas Lardy：我简单介绍一下，我来自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我们在北京的时候见过方星海先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前任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他 2013 年离开了上海，郑先生接替了他的岗位。

Martin Chorzempa（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我想问一个问题，金融服务监管在各地政府、上海市政府和国家之间的职责是如何区分的？现在从本地金融服务的监管来说，比如一些互联网公司，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它们是由各地的金融服务办公室来管理的，这个职责是这样区分的吗？

郑杨：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是相互支持、相互呼应的。中央主要是对整个金融业的发展有一个规划，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也是对整个金融业的行业进行整体监管。在以前的监管中可能还有一些空白点，比如跨界的、跨领域的、跨市场的一些监管，还有一些监管不太明确的地方，这个就可能由我们金融办来帮助监管部门一起协调和监管。

上海已经率先推出金融综合监管试点。我们要求在上海的金融机构和有关的管理部门一起，对金融业和涉及到金融

的一些行业、企业进行综合管理、联合管理。我们采取“谁的孩子谁抱走，没有娘抱的孩子找一个娘抱走”的理念。通过一年多的试点来看，我们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在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基本上风险可控。我们也为全国的金融改革和监管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赵广彬（普华永道中国资深经济学家）：很荣幸见到郑主任，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美的经贸摩擦对上海的企业，特别是上海的金融企业，可能会造成怎样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都知道现在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具体对上海的企业有什么商机，对境外企业有什么重要机遇？可以大概说几个方面吗？谢谢。

郑杨：这两个问题提的很好。我们金融业对外开放，对上海企业来说很大的一个商机就在于，上海本身就是开放型的城市，我们很多企业包括金融机构特别愿意与外资一起成立一些银证保的合资机构，我们也希望上海金融机构和上海企业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跟外资进行一些好的合作。现有的一些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的业务开展得也很好，可以通过这个扩大持股比例、经营范围，以便从事更多的业务。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美贸易的，这对上海的企业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美双边贸易的整体前景应该是好的。因为中美两国对于贸易还是有能够相互补充、支持、协调的方面，以后应该是更加多一点。

对于上海企业与美国的经贸这方面，我们是非常支持的。我们希望这次中美经贸谈判能够取得很好的成果，更好地促进上海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发展。

Nicolas Veron（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我也是来自于彼得森经济研究院的。在过去几年中，

中国金融业有很多的改革，在很多主要的领域都有一些变化，在分工方面也有一些变化。郑先生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中国金融业改革以及北京、上海、深圳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这三个城市之间有什么分工？

郑杨：我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是充满信心的。我们最近又加强了金融监管，在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协调下，还有其他几个部门的帮助下，肯定可以搞好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而且我们对一些金融企业和类金融企业进行了很好的监管，中央和地方之间有很好的合作，金融体系将会越来越健全，我想这个应该是大家可以看得见的。从去年金融工作会议以来，我们的金融业在强监管、重创新的模式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先要把监管的规则，包括我们的立法明确起来，在规则、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更好地发展。

上海是金融中心城市，正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北京是我们的首都，是“一行两会”所在地，可能在金融管理和信息方面有很大的优势，我们在很多方面也要听从北京的指导，当然我们跟北京也有很多的合作。深圳也是一样，深圳是南方的金融中心城市，这几年发展也很迅速，我们在借鉴深圳的经验的同时，也在学习香港的很多成功经验，以更好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乔依德：谢谢，我们第一阶段的开幕就到此结束。

第一节：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可能的后果及影响

乔依德：下面开始第一节的讨论，主题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可能的后果及影响”。我们有 4 位发言人，2 位是美方的、2 位是中方的，每个人的发言是 10 分钟，我们还留下了 40 分钟时间给大家互动。第一位发言人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明棋先生，他发言的题目是“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及其再平衡的路径”。

徐明棋：美中贸易失衡问题及其再平衡的路径

徐明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我做了英文的 PPT，因为 10 分钟时间比较短，所以我还是用中文讲，麻烦翻译把我的演讲翻译成英文。

我主要的观点是，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出口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逐步回归到相对比较缓慢正常水平的趋势（图 1）。这几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尤其是前两年实际上是在负增长，2017 年重新恢复增长，但这个增长是和世界经济总体的增长态势有密切关系的。2017 年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走高的态势，中国的出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始有比较好的恢复，但是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出口增长率是回调的，而且回调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尽管如此，中美的贸易失衡，也就是说中国的顺差、美国的逆差总体上是在不断走高的，2016 年经过暂短的回调之后，2017 年又开始往高走。虽然双方的数据不一样，但是把

它画成曲线的话还是非常平衡的（图 2）。双方都知道统计数据上有差异，但是双方的数据表现出来的总体趋势是非常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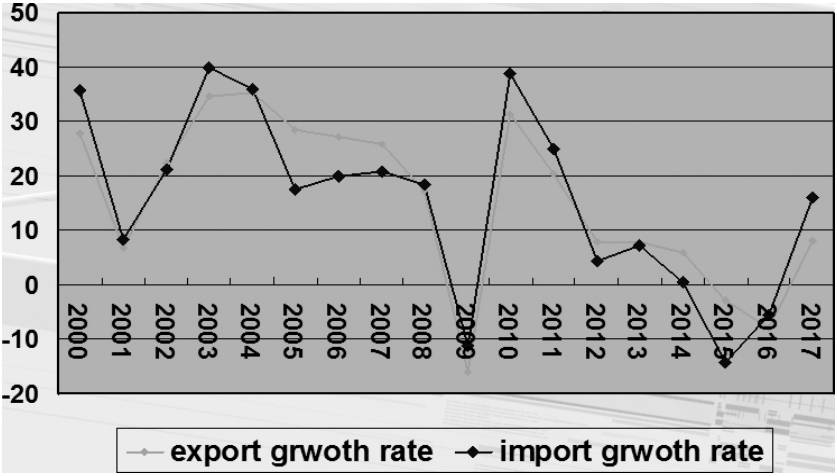

图 1：2000 年以来中国的进出口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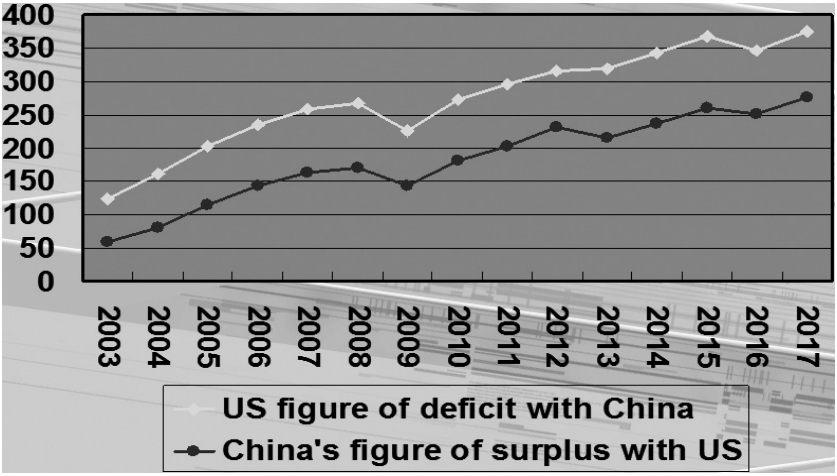

图 2：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从经济学家来说有共识的。首先，因为美元是一个国际货币，它要不断增长供应使世界经济、国际贸易能够顺利进行，交易的媒介要不断增加，也就是说全球流动性主要是靠美国增加的。换句话说，美国要长期维持逆差，但是这个规模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如果规模太大，人们对美元失去了信心，美元的价值不稳，也会导致国际上出现问题。

另外，美国经济长期是由消费来推动的。实际上，美国的消费者长期因为前面的因素享受了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所能提供的高福利，通过美元输出，进口了大量商品，形成了这样一个消费推动经济的结构，这也是导致美国长期逆差的最重要的原因，对华逆差也主要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与此相适应的就是美国国内的国民储蓄率非常低，常常是负的，危机之后开始变成正的，但仍然是偏低的。我们学经济的都知道宏观经济基本的模型，一个国家的贸易或者经常帐户的顺差逆差，主要是由一个国家的国民储蓄率决定的，当消费投资大于储蓄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是逆差的。

全球化也使得失衡进一步加剧。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生产，最终产品返销到美国，导致以海关数据统计衡量的国际收支失衡，对美国来说逆差会进一步加大，因为中国承接了美国和欧盟很多跨国公司的生产线，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世界的加工厂。那么毫无疑问，按照传统的统计，我们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对美国的顺差就不断加大。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上的体制原因，贸易制度、贸易机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以 WTO 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在推动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层面，取得了比较多的进展，现在在全球的关税、非关税的壁垒都降的

比较低。但是服务贸易一直没有达到真正高水平的自由化，这不利于美国，因此美国在双边和区域的贸易中就主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再就是美国国内的一些政策，尤其是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宏观经济学告诉我们，政府的财政赤字必然会加大经常帐户的逆差，这之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讲了。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高关税惩罚可能也会进一步加剧美国贸易的逆差。如果美国对很多中国商品实施了高关税惩罚，如果美国国内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不下降的话，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进口还是逆差，如果没有国内的商品来替代或者进口商品不能明显减少的话，这一块最终还是会导致逆差。

分析了美国和全球的原因之后，我也讲讲中国方面的原因。中国市场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就是中国的整个经济还是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当中，并没有完全转型成功，很多产业还没有真正的开放。我们现在讨论金融业进一步开放，就说明我们金融业的开放水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另外我们承认，国内很多学者在国际收支问题上仍然存在着重商主义的情绪和思维，他们对政策制定者仍然有重要的影响。很多学者谈到政的时候策，会强调我们出口增加、贸易有顺差总是好的，贸易一旦出现了逆差就会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这的确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进出口政策。

中央现在进一步推动开放的政策，我们承认在不同行业、地区和部门还存在执行上的问题。我一直参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关政策的研究，很多开放的措施在 2013 年就制定了，但是在推进的过程中，还是存在来自政府各个部门

的障碍，这就导致我们开放的速度没有原来预期的那么快。

中国伴随着高储蓄率，高收入也在增长，这方面我就不展开讲了。

国内很多企业对开拓国际市场比对开拓国内的场更感兴趣，因为一旦开拓国际市场以后，只要拿到出口合同，信贷、货款回笼等各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在国内遇到的障碍会大很多，因此只要能够出口，企业会想方设法先出口。

中国从总体上来说，如今仍然有比较重的追赶意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各个产业、各个部门的追赶意识还是非常明确的，追赶的核心就是经济增长。我们现在 GDP 即将超过美国，所以推动 GDP 的增长，到今天还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尽管十九大已经强调速度不再重要，质量越来越重要，但对于速度大家始终还是不敢掉以轻心。要维持一定的速度，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

因此，我认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是导致中美贸易逆差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现在中美双方已经逐渐认识到了这些原因，我们可以通过协商、妥协达成双赢的格局，把失衡逐步减少，最终达到一个平衡的目标。

现在有了这样的基本共识，但在如何缩减失衡的问题上还有一定的分歧，是加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还是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必然是美国通过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出口，才能达成双赢，否则的话就是双输的格局。

在贸易摩擦中，出现了很多指责中国产业政策的现象。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是比较难解决的，中国也不可能去做

重大的让步。因为在国际规则、国际协定层面还没有这样一个可以让贸易投资伙伴国对另一国的国内产业政策实施干预的准则。美国干预中国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是不具备国际合理性和相关规则基础的。

当然，一旦中国国内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的补贴损害了贸易伙伴企业的利益，可以通过案例、双边谈判的形式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大规模全面贸易政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样。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尤其是在执行层面，需要不断改进。但如果通过 301 条款全面实施报复性高关税的话，这也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因为中国作为美国的贸易伙伴，既要维护国家尊严，又需要实事求是的案例，从某个行业具体地来解决某个问题。对中国几百亿甚至一千亿的产品采取全面报复性关税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要最终实现双赢，需要双方坐下来谈判，找到能够削减贸易失衡最主要的原因，以及制定出相应的方法。主要是通过中国市场进一步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包括服务贸易的进口，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双方现在就这个问题已经达成共识，接下来有望通过具体的谈判来逐步解决中美贸易的问题，谢谢。

乔依德：谢谢徐明棋先生的发言。下一位发言人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 Robert Lawrence，他的题目是“中美贸易摩擦”。

Robert Lawrence：中美贸易摩擦

Robert Lawrence（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特约高

级研究员，原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谢谢各位。对于刚才的经济分析，我同意大部分的内容。我觉得缺乏的是政治经济角度的分析。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 20 年的中美贸易，其中非常成功的一点其实就是：维系了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但是在中美之间并没有看到有重大的政治摩擦。但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不同了。

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这样的贸易摩擦，主要是因为中国之前发展的方式，其实是和美国之间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有这样的优势：美国公司觉得他们参与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将中国作为一个集合点，在中国市场出售自己的产品和技术，结果就是中国在美国企业界中有很多朋友，当然也树立了一些美国公司为敌人。但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健康的方式，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中美贸易不平衡可能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其实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双边贸易失衡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有什么样的补救方法能够重新恢复中美政治经济双边关系。

从传统上来说，美国其实是使用了一个基于规则导向的体系。但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他其实批判了贸易协定。特朗普认为贸易协定导致了美国的去工业化，他用贸易赤字作为证据来证明他的论点。但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一点，美国政府要摒弃了以前的方法。奥巴马以及之前各届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方式，是我们传统上所遵循的。特朗普他们希望用一系列新的方式，认为这种新的方式能够创造更公平的环境。

首先是要减少美国的离岸外包，其次是要减少美国的进口，他们相信这样能够减少赤字。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非常愿意使用新方法，当规则导向体系适合他们时，他们就使用规

则；如果他们发现规则导向的体系不适合他们，他们就要在规则之外采用单方面行动。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变化，其实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我刚刚描述的大环境大背景下。

下面我分享一下 WTO 一些逐渐被破坏的规则，一些规范也受到了破坏。在 WTO 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国家可以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进行约束，但是这一点约束非常有限，在使用这一条时，各方是非常谨慎的。但是特朗普政府认为这可以给美国很大的优势，因为可以给国家安全确定很多范围。比如涉及到钢铁和铝的时候，特朗普希望能够在钢铁方面征收 25% 的税，在铝方面征收 15% 的税。他们也非常愿意使用这些关税威胁来作为谈判的筹码。新的美国代表团也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磋商，去沟通钢铁和铝方面的关税。这不仅仅是对世贸组织规范的破坏，而且也是违背了最惠国待遇的。

我们知道中方提出了一些响应，对于美方的这些行为，中方首先是试图将之定义为一个保障规则而不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我觉得这其实也不是出于原先的规则。如果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行为，你没有办法将它重新定义为保障规则的方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问题其实是，因为美方的行为，WTO 的做法和规范逐渐被破坏；而当中方进行响应的时候，又进一步破坏了当中的规则。这里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 301 条款。我们知道在 WTO 的规则下，各国其实是不允许超出关税条款水平的，除非有 WTO 的批准，否则不能单方面调整这样的关税。但是特朗普总统现在就威胁说他们即将这样去做，中国受到这样的威胁以后，也用同样的方式去响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WTO 体系其实是受到了破坏的。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两国关系政治方面为什么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在中国已经有了大规模的贸易自由化，中方的官员经常会指出，法律规定并不存在任何歧视，并且否认强制美国企业做技术转让。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外国企业所给出的回应，其实是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美国企业在抱怨说所受到的各种限制，我们从美国商会也收到一些报告，欧盟商会、日本商会也收到过企业的投诉。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能够自由地在海外投资，但是在国内仍然保留各种限制。

如果中国是小国的话，有一些策略可以保持，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这样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我的同事说的是对的，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一国政府去培养工业企业。但我们确实有这样的规则，这些政策不应该歧视国外的企业，针对进口产品或国外企业不应有这样歧视条款。我们看到在《中国制造 2025》政策中，其实有一些美国企业被作为目标，因为其目标是要提升国内市场里中国企业的份额，现在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实现这一点，完全可以不去使用这种带有歧视的、区别对待的方法。

中国使用了不同的规则体系。比如，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之间的技术协议和中国企业之间的技术协议存在差别。可能当外国企业把技术转让给中国以后，10 年后就不再对这个技术拥有所有权了，这样的规则对外国企业是具有歧视性的。

未来会发生什么，在短期内是很难预见的。中国有可能会同意从美国进口更多的产品，如果退后一步，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比如说，不从欧洲或巴西进口大豆或天然气等，

而是更多地从美国进口。但这其实是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个破坏，因为我们想要的体系是每个国家可以根据对于产品的喜好来选择，而不是根据政策方面的压力来选择。

所以从短期和中期来看，可能会有一些政治上的让步，但是从整个体系来看，这些变化或让步有可能存在一些有害性。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比如说关税惩罚，可能对全球贸易一体化进程有一定的影响。未来我们肯定会看到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在中期看来，我们可以更加积极或乐观一些，因为有很多的因素。

首先，其他国家会表现出对于规则导向体系的信任，也就是说他们还是会遵守这个体系的规则。即使美国退出了TPP，其他国家还是遵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于中国的挑战，是要去探讨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能在区域或者在 WTO 去协商一个新的协定，能更好地运行规则导向体系。所以我们会更关注这些规则。

其次，对于中国国内的挑战。不是说要停止这些产业政策，也不是说要去减少中国对于技术发展的需求。中国的产业政策依然存在，但你可以去想象有一些产业政策是不具有歧视性的。比如说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在美国的企业之间不具有任何的歧视性。我们也可以想象中国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政策，在中国运营的外国企业也可以有很多的方案，这样可以减少中美贸易的摩擦。

我认为，如果中国最终能够证明，这样一个规则导向的体系在国内也能够有效运营的话，那么外国企业就能够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如果外国企业在中国的体系内受到更公正的对待，那么有可能不是特朗普，而是美国的下一任总统会把美国带回到规则导向的全球贸易体系。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 Robert Lawrence 的发言！刚刚徐明棋讲到，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其他贸易伙伴不能干预的。但是 Robert Lawrence 讲的非常具体，如果《中国制造 2025》中指明中国企业要在某一个行业所占的百分比，这是不是符合要求？我们中国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怎么来解决？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的。

下面有请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先生。

邵宇：逃逸三重修昔底德陷阱

邵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各位好，我谈的这个话题略微沉重一点。大家看到上一周在北京发生了一轮密集的访问，当时大家的说法就是有很多鹰派过来了。双方官方的说法都是进行了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但是大家也配了一张图，上面画的是是兔子跟鹰在互相扔酒瓶和纸。在最后合影的时候，主要的三位鹰派成员表情都是非常严肃的。某种意义上说，这样一次会谈可以决定全球化的命运。

我们始终认为，所谓全球化，特别是上一轮全球化，可以称之为全球化 3.0，它是由美国领导的、中国加入的整个全球化的过程。它不复杂，美国有资本、技术，中国有劳动力，全球有市场，最后制成品的组装完全由中国进行，所以整个贸易的出口都算在中国头上。中国拿到美元以后，除了自己投放基础货币以外，大量美元通过购买美国长期国债的方式回到美国市场上。发展中国家用大量的储蓄去支撑了美国的金融市场繁荣和长期信贷的来源，这就是全球化的模式。

图 1：北京上空的鹰

既然有全球化 3.0，那什么叫全球化 2.0 和全球化 1.0 呢？全球化 1.0 就是航海时代，全球化 2.0 是英国和英镑引领的时代，全球化 3.0 自然就是美国的时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这样一种中国获得原始资本积累、跨国公司赚到真金白银、美国消费者得到廉价商品的甜蜜过程会如此激烈地被打断，还面临了风险？

大家都觉得特朗普的行动很乱，但实际上是非常有章法的，只是我们不确定这是他自己的想法还是背后团队的想法。比如说他通过减税，目的是吸引很多跨国公司的资本回流到美国，因为这些跨国公司的资本其实就是对中国的 FDI（对外直接投资），每一个 FDI 里都包含大量的技术，比如微软等。那么同样的，特朗普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加强对中国收购美国以及欧洲技术性公司的调查，甚至动用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案》去阻止中国对高科技企业的收购。特朗普还启动了 301 调查。大家都明白所谓的贸

易战、所谓的 301 调查，根本不是谈贸易的，谈的是技术，主要是抑制《中国制造 2025》。

再谈到最近很热门的中兴通讯的案例，通过限制芯片出口，可以说把中国的整个制造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都彻底摧毁了。据说现在也在修改相关的移民法案，阻止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理工类学者到美国学习或签证到美国，因为中国很多技术领导人都是从美国求学后回到中国成为学术带头人的。这似乎是非常系统地去阻止全球化 3.0 的运转模式。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重大变化，是因为特朗普，还是他后面核心的鹰派团队呢？我们认真做了研究，在他的团队里，核心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来自于两个人，一个是彼得 · 纳瓦罗（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另一个是史蒂夫 · 班农（特朗普首席策略师）。很遗憾的是建制派的专家都没有来到他的权力中心。我不知道我们美国的朋友们有多少人为特朗普投票，让他成为了总统，有多少人喜欢他的政治，恐怕是没有的，大部分建制派和民主党人都不喜欢他，很遗憾的是他们离开了权力中心。我们突然发现，长期以来我们所形成的良好的沟通关系已经失去了，包括中美之间经济关系是“压舱石”的这样一种判断可能已经过时了。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样密切的联系和接触，比方说我们以前和美国前财长、各种基金会的联系。

为什么会这样？这里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应该继续韬光用晦。我有一个判断，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韬光用晦，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不够大，所以没有人在意你；第二，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利益团体在暗中支持中国，刚刚已经谈到了，跨国公司和华尔街都是其中

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大家看到了，包括蒂勒森（美国前国务卿），几乎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已经离开了权力的核心。

现在问题复杂在哪里？是不是换一个党派，就能够对中国维持一个比较建设性友好性的姿态？我觉得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当时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是 TPP，TPP 是一个建制的方式，他希望中国能够加强环保、加强劳工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国有企业进行调整。其实这也是中国乐见的，因为中国改革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如此，所以中国迫不及待推出了自贸区来应对这样一种建制性的挑战。但是特朗普上台不一样，他觉得这些太过复杂，而是直接加关税。二战之前有一部臭名昭著的关税法直接加了 45% 的关税，从此就没有国际贸易了，世界陷入了停滞以及全面混乱的状态。

我们认为，不管是决策者还是我们的市场，对特朗普都有一些明显的误判。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商人，只要交换出一些利益的话，就会得到我们自身的相应发展空间。但是很遗憾，我们等到的是美国所发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这份报告里，官方第一次把中国列为一个明显的对手，作为三类挑战当中最主要的，把中国跟伊朗、朝鲜、IS（伊斯兰国）列在一块，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里很多东西超越了简单的贸易战，刚刚提的大部分都是经济上的，我还没有提到政治方面的一些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把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国家？我到现在也还没搞明白，中国究竟是修正了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样中美会陷入一个长期的、被动的、激烈的博弈过程。有人说中美之间是修昔底德陷阱，我觉得如果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美之间现在的困难，恐怕过于乐观了。因为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古代雅典跟斯巴达之

间在同一制度下关于权力的竞争，是 NO.1 和 NO.2 的冲突。但是中国和美国不光是权力冲突，它牵涉到制度甚至文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多重修昔底德陷阱。我们需要极大的智慧、耐心，使我们能够在各方面进行更多的交流、合作，寻找最大的利益公约数，才能脱离所谓的三重修昔底德陷阱。这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乔依德：谢谢邵宇先生，我们这一节最后的发言人是来自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 Mary Lovely，她演讲的题目是“海外对华高科技产业投资”，有请。

Mary Lovely：海外对华高科技产业投资

Mary Lovely（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特约高级研究员）：谢谢，非常荣幸今天来到这次的会议，也非常开心跟各位同仁进行今天的讨论。

我们现在也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现在针对贸易方面的纠纷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打算。在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之间有互补的特征，可能会带来一个有建设性的磋商。我们现在应该进一步考虑两国在过去 40 年间所建立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总统这一届政府有其特征，他其实没有得到美国人民的广泛支持。最近做的调查，美国人也是更加倾向于选择中国学生。其实我跟中国学生有非常好的关系，跟他们的家庭也有非常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记住这样的背景，知道特朗普这一届的政府是与众不同的，他所做的政策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纠纷需要去解决。

从高科技产业角度来说，中国的焦虑是要实现高质量的高科技发展，能够去满足中国人民的需求，想要有更好的薪

水和更好的环境保护，使受到高等教育的人群能够确保就业率。在美国，我们的担忧其实是我们的薪水停滞不前，但是把这个完全归咎于中国是不公平的。除此之外，还涉及到贸易方面的不平衡。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在贸易顺差方面是在不断增加，但美国在税制方面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整个贸易逆差可能还要加大。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这种冲突持续存在，这涉及到整体的平衡。

我准备的这篇演讲主要是针对国外对中国高科技的投资，我认为这对于理解两国的贸易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高科技产业在两国都是高速增长的。这些行业分布在各个国家，有一些公司（通常是跨国企业）可以利用各国的知识和环境。这对于中美两国都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增长，包括消费者的福利，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可以使用苹果手机和电脑。我们对于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做了一个深度的观察，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一些近期的动态。正如我刚刚所说的，科技企业是我们现在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有一些人担忧中国的科技来源，也有人希望对中国有一个长期的准入限制。在《中国制造 2025》中似乎提出了一种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外企的竞争。

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在高科技产业的所有权是在上升的，图 1 就是 2011 年和 2016 年高科技公司的资产占比，绿色的部分是国产的，5 年间是在上升的。外资直接投资高科技公司的占比是缩小的，港澳台投资比例没有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外资在高科技的不同产业有不同的比例（图 2）。在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占有很大的优势，但 2016 年有下降的趋势。其他领域外资的资产占比是比较低的，一方面也是由于政策方面的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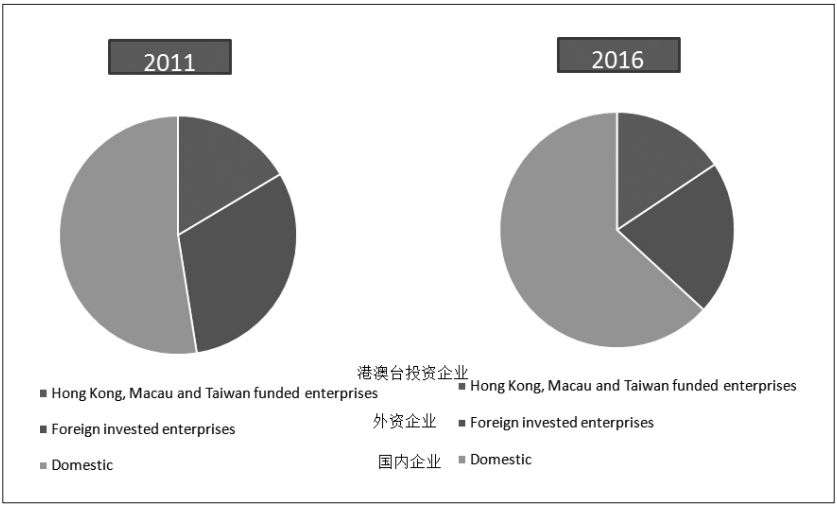

图 1：2011 年和 2016 年高科技企业的资产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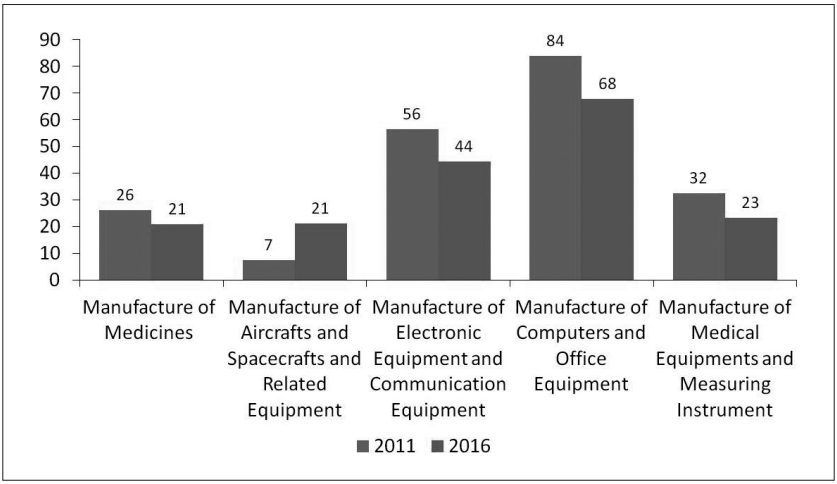

图 2：2011 年和 2016 年外资在高科技产业的资产占比

国内的行业是否提高了自己的业绩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国内产业的业绩有两个指标，一个是高科技产业的出口占比，国内产业的出口占比是比较低的，

但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上升，这是国内行业提高了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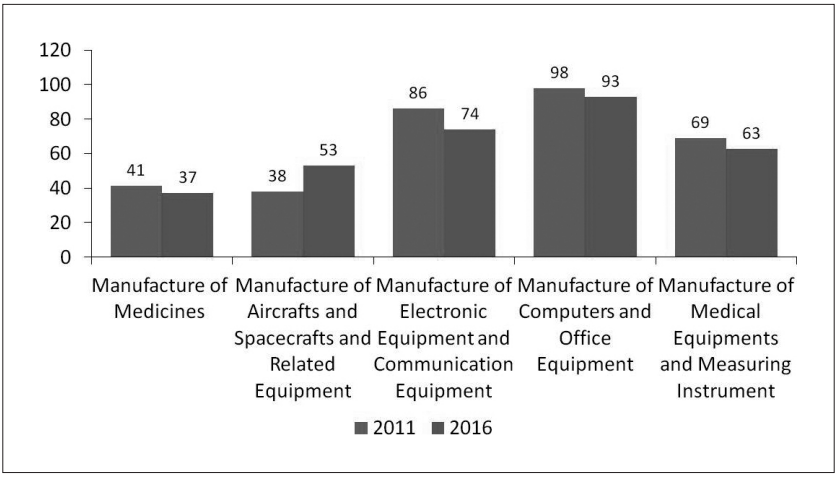

图 3：2011 年和 2016 年外资企业在高科技产业的出口占比

我们可以看外资企业在高科技产业的出口占比（图 3）。在某些领域，外资企业的占比仍然非常高，特别是在计算机和办公设备中，93% 来自于外资企业的出口。在电子产品和手机方面是 70%。我们可以看到在 5 年间这个数字是略有下降的。各行业中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这跟行业的特征有关。手机通讯行业、计算机行业，供应链是非常分散的。外资企业也希望看到关税的降低。

我们看高科技制造行业的出口占比（图 4），这里可以看到外资的高科技企业的出口总体略有下降。这个模式是比较独特的，国内的高科技制造业的的出口是略有上升的，这包括一些初创企业。

图 5 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中国的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直接投入的流入量。外资企业作为技术转让的重要来

源，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高科技制造方面，合资企业并没有外资企业那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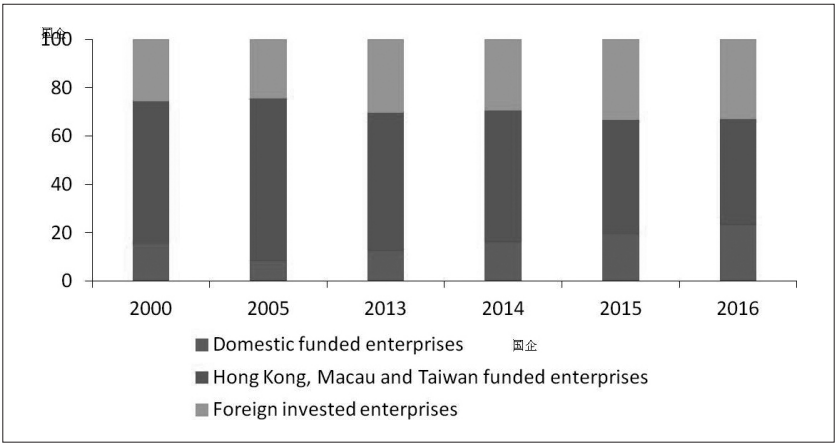

图 4：2000 年、2005 年和 2013—2016 年，
不同所有制的高科技企业的出口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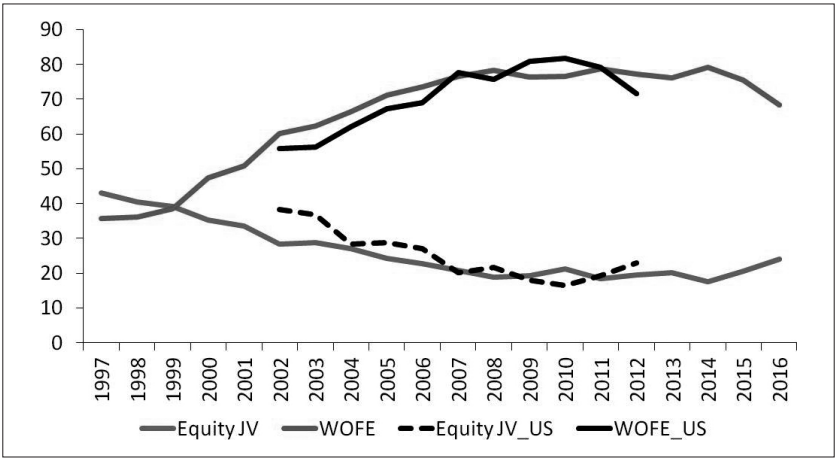

图 5：1997—2016 年外商独资与合资企业
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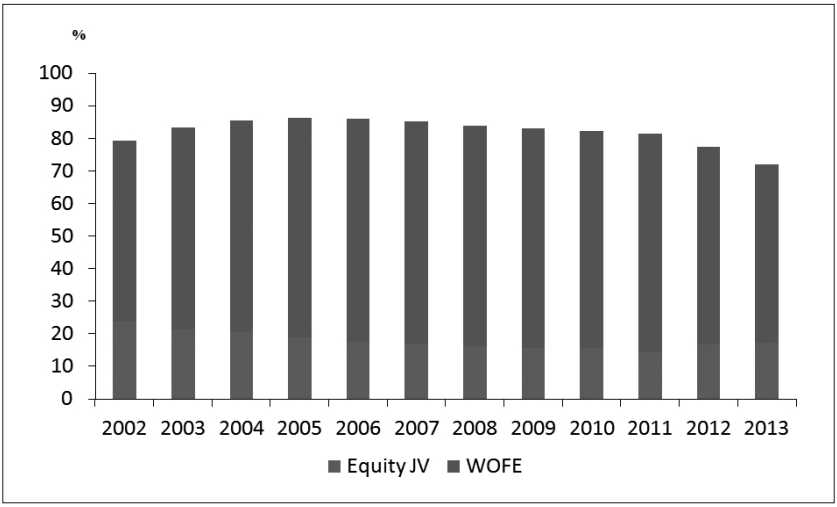

图 6：2002—2013 年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
在高科技制造业的出口份额

我今天在这里展示这些图表，是希望我们的讨论是基于这些事实的。我想做最后的几个点评。首先我们可以从数据中看到，高科技产业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产业是非常分散的，非常依赖于全球供应链的，在经济中都有非常乐观的未来。在高科技产业中，在中国的外国资产的比例正在迅速下降。所以要记住，在中美贸易过程中遇到纠纷的时候，我们要从行业的事实去分析。如果是由鹰派来做决策的话，可能有更多的冲突。谢谢！

乔依德：谢谢，高科技领域也是中美摩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下面是讨论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已经比议程落后了不少，但至少还可以讨论 20 分钟。如果大家想提问，坐在前排的可以把牌子举起来，后排的举个手，大家有序地进行评论或者提问。发言者请先自报家门，说一下自己是什么单位的。

讨论

任晓：我是任晓，来自复旦大学，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我的问题是针对 Robert Lawrence 博士，彼得森研究所对特朗普提出过什么样的建议？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这边给他们的建议对美国人民有什么样的影响？

Robert Lawrence：我并不是彼得森研究所的常驻或全职研究员，所以我对于他们给特朗普怎样的建议并不是完全清楚。但是我们对于特朗普破坏规则是持批判态度的，我们经常批判他们使用双方贸易不平衡作为一个谈判筹码，我们之前跟他们也讲过，这种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不一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贸易政策并不是由我们专家去制定的，就像我们之前指出的一样，总统本人有非常强烈的个人意愿。我们彼得森研究所对此并不是很支持，可能有人误解这个政策是由我们提出来的，但其实并不是，我们对于他的这些贸易政策以及他用的这些方法是持批判态度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些政策并不是由我们提出的。

刘鸣（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Robert Lawrence 先生演讲得非常好，但问题是 WTO 以规则为基准的体系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在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事件中，并不光是经济政策或经济规则，不是说中国改变自己的这种歧视性政策或《中国制造 2025》目标就能解决问题的。

当然我们中国政府可以做一些调整，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非常独特的系统，中国的发展模式是非常独特的。我觉得可能不光是特朗普政府或美国的一些人，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 WTO 本身的一些

传统规则跟中国的体系、发展模式不能平衡或一致，或者说我们国家和一些企业的模式，西方国家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

在全球五百强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国企，这些国企是非常富有的，也推动了很多的高新技术以及创新，有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中赶上美国企业，所以这才是关键。有些人觉得这才是中美之间竞争的关键和核心，所有贸易问题、市场问题或技术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深层的主要原因的话，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我们这些精英阶层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谢谢！

Robert Lawrence：我也简短说一下，我同意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些关键的挑战，就像我们之前讲到的一样。这两个国家的体系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同样的规则体系之下去和谐共存，同时还要结合我们两个体系之间的不同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刚刚大家讲到我们现在有两个不同的系统，两个不同的系统也可以相互依赖，如果去破坏这样一个贸易的关系，对于双方都是有害的，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方法能够去共存。

我认为有机会创造一些规则，让我们两个体系能够更和谐地共存。现在 WTO 还没有去很好发展，特朗普政府支持一些保护性的政策，但他并不是保护主义，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出现的贸易摩擦，他只是要对本国的市场做一个保护。两个不同的体系之间中间可以有一个缓冲地带，我们可以去创造一些规则，允许这两个体系之间有所不同，能够求同存异，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关注这些问题。

现在我们有很多民粹主义的力量，我怀疑如果整个贸易体系都受到破坏的话，我们未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也就是说那些为特朗普投票的人，他们会受到很负面的影响，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挑战，当然这也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Nicolas Veron：对刚刚 Robert Lawrence 所提到的，我想补充几点。我们有一位同事今天无法加入我们的研讨会，但是他经常讲一句话："我们对任何一个党派都不具有任何的承诺。"我们彼得森经济研究院是一个机构，我们很多研究员都在争论，彼得森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立场，不会作为一个机构统一给出一个建议。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指明一点，我们有很多研究员觉得特朗普的政策是错误的。我们经常会讨论，希望能够去引起政府的主意，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有时候共和党会更加主张自由贸易，因为他们的经济主张和政治主张就是这样的。尤其是在过去的 10 年中，民主党会比较注重保护主义，可能有时候会听我们的想法。刚刚大家提到了一个政府里的人，他在很多场合都当众批评了我们彼得森研究院，他认为我们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恶魔，对我们整个研究院持反对的态度。

现在有一个倾向，大家觉得特朗普是没有策略的，无法解释他的一些做法。如果我们详细分析华盛顿政府的话，会发现他的做法是非常没有规律的，他自己没有章法，他有自己的想法，有非常强的个人观念，但是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略，有时候他推出来单个的政策，并不是一个体系。但他的团队是有计划的，有的人希望能够破坏 WTO，有的人希望去阻止中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目标。这并不是特朗普本人自己的想法，所以有时候不要太过于专注总统本人的想法。

赵广彬：我有两个问题想要问 Robert Lawrence 先生。我听说您也是克林顿的经济顾问，所以我想问，如果希拉里成为总统的话，你会给她提什么样的建议来处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兴的案件。几年前我们的乔秘书长也安排过这样的会议，也是在这样的会议室，也是这样的几位专家。当时我听说美国政府已经拒绝关于中兴的任何商谈，之后我们又从新闻上看到美国阻止了中兴的出口，也就是特朗普最近做的这件事情。这种事情在美国历史上是否经常发生？您对于这个事件是怎么看的？如果希拉里上台的话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Robert Lawrence：我之前的确给克林顿政府做过咨询，但是他不会听我的意见，特朗普更不会听我的了。我希望他能够忽视这种贸易逆差，我觉得这种贸易逆差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在政策角度不应该把解决贸易逆差当作一个重要的目标。现在美国其实出现了一些外交方面的问题，这个结果并没有原因重要，也就是说其中的参与者可能认为如果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会更好。但其实我会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建议，如果解决不平衡才是你的目标，那你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公平，尤其是当我们两个国家的体系是非常不同的情况下。

对于中兴的案子，我们已经听到了一些来自于中国方面的观点，这并不是说中兴没有破坏规则，而是说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应被这样对待，不应该直接被禁止出口。所以我建议是找到一个方法，降低对中兴的制裁，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暴露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下的脆弱，我们要做的是去保护而不是破坏全球的供应链。所以我希望这个结果是正面积极的。特朗普总统发表了推特之后，美国政府是希望用中兴的案子作为一个谈判的筹

码，能够让中国去做一个让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协商者而不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决策者。

张海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谢谢乔老师，我有两个简短的评论和两个问题。我们很明显感受到中美目前的经济摩擦或贸易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战略安全的问题，所以非常复杂。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美方学者包括智库，他们普遍认为："虽然我不喜欢特朗普这个总统，但是我认为他做的事情是对的。"这样的一种看法是非常有普遍性的。

我们在布鲁金斯学会座谈的时候，他们的学者提出：中美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全球化，技术发展对社会的冲击、撕裂，贫富分化对美国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造成巨大的挑战。中国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就是政府的治理跟不上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弥补社会融合治理手段的不足，需要一致对外寻找一个目标。可能在这一点上中美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把对方设为竞争对手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崔天凯大使在中美关系 40 周年研讨会上也说了：从长期看，中美的竞争不是在国际，也不是在彼此，都是在自己国内的治理竞争上。

基于这些观察，我想给美方两位发言人提两个问题。中美之间的贸易竞争或经济竞争，恐怕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即使在特朗普总统之后，恐怕会是一个越来越激烈的趋势，你们同不同意这种判断，就是它不是一个短期性问题，而是一个长期性问题？我也注意到两位学者都特别强调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以及要公平对待彼此的投资。我在美国的时候听到最多的词就是对等贸易，如何给对等贸易和公平贸易下一个定义？这是我的第一个评论和问题。

第二，我也注意到，我想在中国也有共识，中美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战对中国也是一个好事，有助于我们全面反思我们的产业政策和开放政策，中国也有问题。我们在使馆座谈时也谈到，中国把政策愿景和政策目标呈现出来之后，可能给美国或国际社会造成一种政策错觉。《中国制造 2025》，包括十九大的报告，提出的一些目标都是政策性的愿景，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并不是一定要实现的目标。但是，这样的产业报告出来了以后，这种愿景就变成了中国政府的真实意愿，得到了很多的误读，说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进行一些不公平的措施，甚至可能未来在国际上采取进攻性很强的姿态。实际上《中国制造 2025》也好，十九大报告也好，很多报告都是为了鼓舞国内的民众做的一种政治宣示式的阐述。所以第二个问题我想问徐明棋老师和邵宇，我们的产业政策和政策文件方面，如何能够从中美贸易摩擦里吸取一些教训，能够真正的规则化，而不是政策化的语言导致误读，变成了战略性的对抗。我想这个问题恐怕很大。谢谢。

邵宇：我首先想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出现这些问题？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一般民众，特别是美国选举特朗普上台的民众，觉得在全球化里是受损的，需要补偿，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这个没有问题。精英们其实也觉得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如果现在不对中国进行一定的抑制的话，那就永远不可能抑制中国了。是不是美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

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谈下架了的那部电影《厉害了我的国》，我们就是自己高兴一下，结果没有想到全都当真了，这个误解是一定有的。美国出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我

觉得它可能也是比较偏极端右翼的人写的，但我们觉得很有威胁。美国对中国这次的贸易战的底线是什么？是终止《中国制造 2025》计划还是什么？这就是我的问题。谢谢！

Mary Lovely：谢谢刚你的提问，其实是回到我先前讲的这个内容。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或《中国制造 2025》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是政府在推动两国的关系。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或者是从学界来说，其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公民社会让我们去打造维系这样友好的关系。

美国确实有很多人，他们觉得从科技或经济方面受到了损害，所以选择了特朗普。这需要我们对于中美两国的关系做一个更好的表述。我们必须要寻求一些政策去支持两国的关系，同时也要知道中国对于美国的一些批评，对于保护主义的一些批评。美国批评中国的《中国制造 2025》，从任何一个行业政策中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描述。所以我觉得双方都需要去处理批评的声音。我们领导人确实需要去做一些回应，这种负面的方法造成了现在的焦虑。

冯军：我也有一个问题。我是在大学里教法律的，而且这辈子也一直在学法律，20 年前我去学国际法。尽管有很多的原因，但至少我觉得条约必须要遵守，我的感觉是美国是很遵守条约的。但是到了特朗普这一届，条约可以不遵守了。这对我们学法律的，对所有要遵守法律的，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在跟随美国，美国还是老大，这没有什么疑问。所以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你们是怎么看待美国现在不在乎国际法的？当然你们不是搞法律的，这个问题可能不太合适，但是对于彼得森研究所来说，你们有时候也会写一些关于国际法的文章，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为的？谢谢。

Robert Lawrence：首先，有很多从事国际贸易的美国人还不相信美国不遵守国际法。事实上，正如你早先提到的，在美国的贸易历史中一直在执行规则导向的体系。可能有的时候，美国是在 WTO 框架下制定一些双边贸易协定，但还是以规则为导向的。

我希望现在只是短暂偏离我们原来的轨道。我再调整一下我的说法，现在的政府相信他们是有无上权利的，所以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依赖规则。他们在适合的时候就引用规则，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使用美国的权利去做强行的双边协商。我认为他们夸大了美国政府自身的权利。

我认为，现在特朗普政府的情况是一个短期的偏离，并不是长期都会采用不遵守规则的做法。我非常高兴你是一个贸易法的专家，我不是法律的专家，但是我希望未来会看到中美在一个以贸易规则为导向的体系下和谐共存。

这也回到了什么是公平的问题，在国际贸易中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平？我觉得这是个形而上的问题，大家认为都公平就是公平，并不是说规则里说什么是公平，而是双方都要认为公平才是公平。

现在是一个短暂的轨道偏离，未来我们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而且当前的这个问题对我们美国来说也是一个教训，或者说是一个可以很好学习的过程，TPP 是一个例子。

乔依德：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有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以后再慢慢讨论。四位发言人都做了很好的发言，大家也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讨论，这一节我觉得各位都讲的很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四位发言人表示感谢！

第二节：海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识别和防范

Martin Chorzempa（主持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我们下一个环节的议题是有关对外投资的，大家都知道对外投资有很多机会和风险，包括国家安全和经济等方面。今天有几位来自于中国和美国的演讲者会对此做一个分析，首先有请乔依德先生进行分享。

乔依德：基金会研究报告发布
——《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与防范》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大家桌子上有一份我们基金会做的研究报告，题目是《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识别和防范》。我用非常短的时间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报告。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了非常迅速的发展，但是也碰到了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风险，也可以说遇到了很多挫折，这是我们做这样一个研究报告的直接原因。

做这个报告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中国经济正在转型，从重视数量走向重视质量，对外走出去可以说是我们进一步开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对外开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我们自己走出去，这样一个趋势并不是短期的。尽管大家知道 2017 年我们对外投资的数量是下降的，但是从长期的趋势来讲，这必然会成为一个大国走向强国的过程。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是很复杂的，不确

定性很多，复杂的因素也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做了这个报告。特别是中央也把防止金融风险作为今后两三年的一个重要目标，对外投资金融风险也是我们要防止的系统性风险的一部分。我们做这个报告是从以上这几个方面来考虑的。

做这个报告的方法也是很简单的，我们进行了资料梳理和问卷调查，可能在座有一部分人也参加了我们的调查。我们有线上线下的问卷，问题放在研究报告的附录中，大家可以知道我们提了哪些问题，有的是通过互联网收集的。另外我们进行了一些案例的分析，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我们报告主要分为 4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增长的速度、结构以及所面临的风险等方面介绍我们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况；第二部分集中讲中国对外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哪些；第三部分将风险按照区域、国家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我们从国家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对怎么防止中国对外投资的风险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等一下我的同事会讲我们研究报告的主要观点。谢谢。

何知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风险及其政策含义

何知仁（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回答两个问题，如何去识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风险，以及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怎样预防这些风险。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设计了调查问卷，对中国的一些专家和研究员以及企业经理人做了调查。我们得到的调查结果和我们的分析是相当一致的，我们发现在中国的 ODI（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中，目前最大的风险是政治风

险，这个政治风险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国家安全审查是政治风险的一个来源。国家安全审查在世界各地都有，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做，比如说印度也在这个方面采取了行动，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资本的流入。这其实是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论，是中国 ODI 的一个主要障碍。

还有其他的风险，比如说法律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这些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在这里我们可能没有时间一个个去讨论。我们今天有很多关于风险的讨论，其他的演讲者可能会讲到更详细的内容，所以我们直接谈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去防止风险。

中国威胁论有一个观点是，中国政府正在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利，支持海外的高科技企业的收购或兼并，来实现他们的产业政策。余永定教授在北京发表过一个讲话，他认为这个判断是完全不正确的。我想说中国的企业肯定主要是追求利润的，而不是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去做生意，但是对于少数国有企业而言，产业政策对它们可能还是有影响的。我们发展中国家是需要产业政策的。从总量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人们会认为这样一个开放型的经济体，肯定会产生一些溢出效应，这也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尤其是中国的 ODI 正在迅速发展，这些冲突是自然存在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削弱产业政策与企业活动之间的联系，来缓和这种冲突。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既可以制定产业政策又可以鼓励对外直接投资，但是应该避免把这两个目标相互混杂在一起。如果要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话，中国政府应该着眼于改善市场环境和刺激更多的市场力量，我们觉得在这个方面可以有三个方面的改进：立法、税收和咨询。

首先，中国的 ODI 立法还不健全。在中国国务院的层面，没有专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办法，而且国务院不同部门有几份不同的文件，发改委、商务部和外交部都有自己的规则来管理对外直接投资，有时候这些规则是相互冲突的。一个 ODI 的项目，必须要获得所有这些部门的批准才可以实行，这样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中国应该在国务院层面有一个关于 ODI 的统一的管理办法，不同部门之间的权责也应该有更清晰的分布。

在税收方面，中国可以扩大现行的税收饶让抵免（Tax Sparing Credit）。在税收饶让的安排下，在外国被免征的税将被视为已征，否则，这些税可能在本国被要求补征，从而抵消外国税收减免的效果。现在中国已经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建立了很多的税收饶让安排，然而有一些国家，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并没有与中国建立类似的安排。此外，中国可以考虑使用 ODI 亏损准备金制度。这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日本所做过的一件事情，如果国内公司从海外亏损的话，可以从准备金中提取资金，如果盈利的话，可以用准备金付税。

在咨询方面，我们建议中国政府能够鼓励私人 ODI 咨询公司的发展，因为它能够帮助投资者减少在 ODI 项目执行之前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可以保护其权益。我认为这种需求是巨大的，并且在未来几年当中会持续增长。

这些都是对中国政府的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方式来支持 ODI。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必须要认识到 ODI 要比国内投资的风险更大。在 ODI 项目之前，应当基于潜在的利润和风险，而不是基于国内产业政策，慎重地做出投资决策。如果公司只是遵循产业政策，在短期内这

个项目有可能面临被国家安全审查拒绝的风险，长期来说这个项目可能面临着重大的经营风险和经济风险。

对发展中国家的 ODI 决策不应该主要依靠政府的保证。大家知道一些发展中国家通常给予外国投资者富有吸引力的条件，但是其中许多国家的政治环境不稳定，这是我们应当充分考虑的。在发达国家，也不是说中国公司不能够进入到一些高科技行业，但是我们强烈建议他们认真学习这些国家的相关法规。此外，各个的国家的敏感行业不同，比如中东国家对石油生产是敏感的。我们建议企业应当制定一整套的战略去追踪和处理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的风险。

我们的报告中有很多详细的提示，比如说人员培训等等，我们还提供了很多的案例，我今天也没有时间一一介绍了。最后我想说的是，风险并不等于危险，通过充分的研究和准备，中国企业可以极大地降低 ODI 的风险。谢谢！

Martin Chorzempa：谢谢你的分享，下面我们有请 Nicholas Lardy 先生。

Nicholas Lardy：海外直接投资的风险

Nicholas Lardy（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我要谈的是海外投资的是金融风险，这涉及到一些成熟度的不匹配或货币的不匹配，我想用安邦的案例作为解释。

在中国保监会放开保险产品利息上限后，安邦保险跟中国其他保险商相比，在这个方面做了更大的投资，他们做了一些短期贷款，主要是在 2 万亿人民币的市场中去调整，很多是在美国的资产或在加拿大、英国、比利时的资产，我想这个模式不是可持续的，这里有一些流动性的问题。2 月

份的时候政府接管了安邦保险，安邦作为一个保险公司，国内一些投资者的股权都被收回。对于安邦来说，有 3500 万国内客户在他们公司购买了保险产品或投资产品，大家都意识到这个公司没有办法再去履行责任和义务，所以由政府进行接管。现在安邦在监管下，应该有非常好的方式使公司再回到私有投资者甚至是国外投资者的手中。

对于海外的投资来说，大连万达其实也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对于安邦来说，有一个成熟度不匹配的问题，他们做了很多的远期投资，但使用的是短期资金。政府禁止安邦 3 个月内申报新产品，使得其流动性一下子就降低了很多。有些中国居民买了投资产品，对于他们来说，安邦所发的这些产品其实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产品无法履约。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更多去注意的，除了成熟度上的不匹配以外，还有货币上的不匹配，因为有一些货币是要转成人民币，再转换成外币去投资。有些公司收入的是外币，比如美元或欧元，但是他们最终的客户是使用人民币的。

说到“一带一路”战略，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是从外界来的投资，主要是中国的信贷提供给各国的项目，这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因为有的项目如果违约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这跟 ODI 的问题可能是相似的。“一带一路”项目看起来好像缺乏透明度。我觉得中国政府其他不同的方面，其实也是缺乏透明度的。针对“一带一路”发布的一些数据，由发改委发布的数字可能跟其他部门发布的数据有一定的差距，有一些数据没有很好地描述整体支出以及具体的信息，针对各种贷款利率的信息也是缺乏的。

对主要的国际机构来说，他们没有办法收集到在这些项

目的数据。我知道在中国有个小的队伍在负责“一带一路”项目。但是我想说的是，现在披露的信息是不够的。可能在很多沿线国家的项目中会面临债务问题，可能最后会变成投资，而不是贷款。

Martin Chorzempa：谢谢，他给我们介绍了安邦投资和“一带一路”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是王晓东先生。

王晓东：绿地海外投资的目的、进展和遇到的问题

王晓东（绿地集团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我分享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绿地的概况，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目前在海外的布局，第三个方面是我们走出去的动因是什么，第四个方面是在新形势下海外投资呈现的六个特点，最后一个方面是我们认为海外投资需要防范的风险。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绿地集团的概况，有四个关健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房企龙头”，我们在中国和国外投资比较多的是超高层建筑。我们在武汉规划了一个 636 米的超高层建筑建筑，现在已经基本上封顶了。第二座是 450 米高的南京绿地中心，坐标在南京鼓楼旁边。我们在超高层开发方面是比较有名的企业。

第二个关键词是“转型典范”。从产业布局来讲，我们是“一主三大”，“一主”是指房地产是我们的核心主业，除此之外还有三个辅助的产业，分别是大基建、大消费、大金融。这两年我们也在慢慢布局开拓新的产业，包括科创和康养，其中“一主三大”在海外有所落地。

第三个关健词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从我们的股权结构来说我们是“混改标杆”，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们既有

国有股份，还有经营者以及市场化的机构投资者，我们是三元混合的股权结构。我们公司 2015 年 8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整体上市。

第四个关键词，我们是中国企业“国际化先锋”。 从布局来讲，我们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 1992 年开始是第一个十年，主要是在上海发展的；第二个十年开始走出上海，走向全国，基本上在全中国除了西藏、台湾以外的所有省份都有投资，所有省会城市已经全覆盖；第三个阶段是从 2012 年开始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我们在国际化方面走的比较早，成效也比较显著。

这是第一个部分，讲我们绿地集团的概况。

第二个方面是介绍绿地集团在海外的布局。我们现在的项目遍及了四大洲 9 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有，一共是 13 个城市，包括悉尼、纽约、洛杉矶、伦敦、东京等城市我们都有投资，现在一共有 18 个项目在建。第一个项目是 2012 年在韩国济州岛（离上海 1 小时航程），到现在布局了 9 个国家 13 个城市 18 个项目，所有项目的总投资是 210 亿美金。实际上我们是分期投入的，资金的量没有那么大。

第三个方面我想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我们自己认为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外因，2012 年受美国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海外资产价格比较低，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一个窗口期，我们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同样的资产，比如纽约核心地段酒店的价格，要比上海同样地段的酒店价格低很多。我们看到资产价格存在一个差异，所以我们要把握外部的因

素走出去投资。

第二个是内因，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要拓展发展空间，因为企业要做大必须要拓展发展空间，我们原来是在上海，后来是在全国，我们认为企业要进一步扩大就是要到全世界去。第二，要整合全球的资源，现在全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好的资源分布在全世界，所以我们要整合全球资源。第三，要提升管理水平，中国的企业普遍来讲，运营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在管理水平上和美国跨国公司这些百年老店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希望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也可以变相提升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第四，这是成为一个世界级企业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市场非常大，中国的市场已经成就了很多世界五百强企业，我们公司已经连续 6 年入榜世界企业 500 强。但是我们认为，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水平跟真正的跨国公司还是有差距的，我们认为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还是要布局全世界。

第三个方面我想简单介绍一下绿地集团海外投资的六个特点，这六个特点也是根据政策、市场、形势的变化不断在进行调整的。

第一个转变，从定位来讲，我们从做中国市场的海外延伸，向全球市场转变。我们走出去最初是想服务中国客户，相当于中国外溢的购房需求。买我们房子的是中国人，只不过他因为小孩在海外留学，或者他出去旅游买这个房子。现在因为中国外汇管制的原因，中国的外汇要到国外去买房有难度，这不属于经常项下，而是属于资本向下。所以我们在海外主要面向于全球市场，我们的房子以后希望更多的卖给外国人，而不只是中国人。

第二个转变，我们原来的开发模式和中国房地产开发模

式一样，今天买地，明天建房，后天卖房，很简单。现在我们认为国外房地产操作模式跟中国不一样，更多是要靠一个长时间周期来实现比较好的收益。我们现在还是做销售，造房卖房，另外现在也在不断持有，就是留下一些资产，通过运营来提高收益水平。在日本东京的千叶，我们有一个写字楼项目和一个商业项目，开了一家日本最大的免税店叫LAOX。

第三个转变，以前是单向走出去，现在我们既要走出去还要引进来，要把海外的资源带回中国，为中国所用。特别是上海今年要召开中国国际进口商品博览会，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也在布局，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满足中国中产阶级消费升级的需求。海外有很多好的产品，性价比很高，但是在中国市场可能买不到，这就是一个供给侧的问题，中国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我们在海外，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已经有投资，我们利用在当地的渠道把当地的产品带回中国来。我们在做中国进口商品的直销，在几个国家都成立了直采中心，当时胡延照副市长也出席了我们的揭牌仪式。也就是说，我们在海外成立采购中心，把海外好的商品以低价带给中国的消费者。

第四个转变，我们原来在海外是多点开花，每个国家每个城市可能都有布点，现在我们慢慢在聚焦，尽可能聚焦到市场空间比较大、市场又很健康的国家和城市。举个例子，我们在悉尼先后一共开发了六个项目，快的已经交房，慢的还在开发当中，完全是系统开发、滚动开发。我们不需要再投资资金，它完全可以自己循环，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体系，是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操作模式。

第五个转变，我们原来在海外是做住宅市场的，现在除

了住宅还投资开发商业、办公、酒店，包括刚刚我讲到的日本东京的免税店。我们在美国洛杉矶的斯台普斯球场边上建了一家 Indigo 酒店，这个酒店在洛杉矶也是非常好的酒店，它房价高的时候可以卖到 500 美金，都是我们自己持有的物业。所以，我们现在不光投资住宅，还有酒店、商业、办公，同时除了房地产之外，还布局基建业、消费业等，这和我们的产业布局也是相关的。

第六个转变，从目标国家来讲，我们要响应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我们原来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现在除了发达国家以外，还要去“一带一路”国家。从去年开始，在柬埔寨、越南，我们也参与了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参与了金融业、消费、商品的采购这些方面的工作。

以上讲的是我们绿地集团在新形势下，海外投资呈现的六个特点。最后一部分我讲一下海外投资需要防范的风险。

刚刚乔依德秘书长已经介绍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做的研究报告，我也仔细看了，这个报告非常全面、非常系统，其中也重点讲到海外投资的风险。从我们自己企业感受比较深的来说，可能有四个方面的风险是需要中国企业关注的。

第一个是市场变化的风险，我们的企业是市场的企业，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市场风险。包括进入的时机是不是正确？我们的目标国家、目标市场的容量能不能容纳我们企业的投资、容纳我们企业的发展？还有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发展空间。因为海外的房地产市场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差异很大，海外的房地产市场非常成熟，每年的增长速度非常有限，不像中国的市场在快速地成长，所以第一个我们对市场变化关注得比较多。

第二个是政策变化的风险。这一点在东南亚国家和“一

带一路”国家我们关注比较多，包括法律风险和文化差异风险。

第三个是汇率变化的风险，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在海外投资，资金非常密集。对资金非常密集的投资来讲，汇率的变化稍微一个小波动就会对我们企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第四个是系统管理的风险。海外这么大投资规模的项目怎么进行管理？这对系统管理带来很高的要求，包括我们的业务怎么管理？我们既要派中国的团队，还要招聘当地的团队，这个团队的文化怎么融合？这都是管理上的问题。还有中国房地产开发的模式跟美国的模式以及其他国家的模式都不太一样，我们还要考虑商业模式差异带来的风险，在中国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房地产是应该这么做的，但是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操作模式是不一样的，实际上这也是有风险的。

以上是将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实践向各位做一个介绍。谢谢！

Martin Chorzempa：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实践的角度，下面是来自于欧洲的角度。

Nicolas Veron：欧洲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看法

Nicolas Veron（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大家好，我来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今天我要讲的是“欧洲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看法”。

我们现在经常会讨论到保护主义的问题。美国在传统上是非常开放的，而且美国市场一般来说比欧洲整体市场更加开放。但是现在欧洲对于中国是更加开放的，他们的做法我

会做详细的介绍。美国正在发生一些法律的和结构性的问题。欧洲和美国对 ODI 的开放态度是有所不同的，相对于美国来说，欧洲对中国的 ODI 是更加开放的，这并不是一个短期观察到的现象，可能在未来几年我们会持续看到这种现象。

欧洲形成了有 28 个成员国的欧盟，其中不包含瑞士、挪威和俄罗斯，但是欧盟涵盖了欧洲大多数的经济体。28 个国家中包含了英国，虽然英国已经决定脱欧，我们现在还是把它作为欧盟的国家。28 个国家中，只有 12 个国家是有国家安全检查的，这几个国家之间也有非常大的差异，有非常不同的目标和方法，还有一些不同的门槛。

对从业人员来说，国家安全检查对于 ODI 的接受程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案子，就是有一个印度人在伦敦建立了公司，2006 年的时候他希望能够收购在法国的一家非常大的钢铁公司，但是法国政府极力阻止这项收购，这个后面还会说到。在接受 ODI 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困难和障碍，但也并不是完全如此。在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在美国也看到这类案子。

各国的框架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在欧洲有一个单一市场的框架。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一个欧洲国家生产，在其他欧盟国家销售，比如说生产一架飞机，你可以在单一的市场为整个欧盟提供服务。各成员国要符合欧盟法律的规定，一家中国企业在欧盟成员国中经营，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在实际上也是给欧盟的公司提供服务。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市场，有一些欧洲市场是非常开放的，有一些是不太开放的，但是单一市场的框架可以给整个欧盟提供服务。

事实上，我们有一个更强劲的欧盟框架，叫做并购控制框架，禁止单一的成员国阻止这样的并购发生。比如说

1996 年在丹麦，有一家西班牙的大银行想要并购葡萄牙的一家大银行，葡萄牙监管机构想要阻止这样的并购，但是欧盟介入说葡萄牙没有这样的权限去阻止并购，除非是有金融稳定原因。因为没有金融稳定的原因存在，最后西班牙银行成功实现了这个并购。

对中国公司来说也是如此，这样的法律能够阻止各个欧盟国家的政府做这样的阻挠，对当地的企业来说是非常好的政策。并不是说这里就没有歧视了，但是我们有单一的法律框架从理论上减少不公平待遇。

现在有银行联盟这样的超级监管机构，可以在欧盟的层面上对银行之间的变动做一些控制，从这个方面来说，跟过去相比，保护主义的趋势更少了。比如说一家中国银行或金融企业，想要去并购一家欧盟的银行，可能 ECB（欧洲中央银行）会抗议和反对，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去阻挠并购过程。

政治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企业想在欧洲去实现并购，必须要符合欧盟法律的规定，必须要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这个行政的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刚刚举的这个例子，法国的钢铁公司最后被成功并购，当时法国不愿意让这样的并购发生，但是法国没有一个框架可以去阻止它发生，最后还是按照原来的要求执行了。

有的国家要从行政角度上审查涉及国家安全的方面，所以欧盟在 2017 年 9 月份发布了一个立法要求，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流程上做一些协调，提高它的透明度，方便之后的决策，但是对于各个成员国并没有很大的限制和约束。其实欧盟的立法机构对于这样一个提案还在讨论中，欧盟也在成员国之间建立了协调机构，去协调这些问题，去做更多的调研

以获得正确的事实。在现在的大环境下，欧盟还没有一个情报机构去做这样的评估，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欧盟的安全审查程序去做，这可能很快就会发生。

现在大家可能会听说，一些中国的企业在欧洲并购欧洲的公司。刚刚王晓东先生介绍了海外房地产的投资，那还只是建筑物而不是人，这个方面还比较容易实现。在欧洲跟在美国不一样，一家中国公司想要去并购一家美国的公司，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近年欧洲时常有一些高科技公司的并购，比如说德国 KUKA 机器人公司，在希腊的公司，保险方面的公司，还有葡萄牙的电网公司。我们听过的最大一起并购应该是三峡集团收购葡萄牙电力公司，三峡集团在这家企业现在有控股权，并且将要有全部的拥有权。几天前还有一则消息，中国海信拟收购斯洛文尼亚家电制造商 Gorenje，这家企业是生产冰箱等相关设备。关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并购，我希望之后能够更多地了解葡萄牙这一并购案的信息。美国和欧洲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欧洲的做法会提供美国一些灵感，美国在这个方面可以从欧盟学习一些经验。

Martin Chorzempa：谢谢，刚刚他给我们分享了一些在中国之外直接投资的情况。在座的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把你的卡片竖立来，我们有 15 分钟左右的时间讨论，请尽可能让你的评论或提问简短一些。

讨论

赵广彬：我有一个问题是针对美国和欧洲的朋友，想问一下对于中国的企业，他们要在海外并购的话，有什么具体

的建议吗？如果他们要在北美或欧洲做并购的操作，有没有具体的指导？。

Nicholas Lardy：在这个领域其实我不是专家，但是我想先说一下，中国企业的并购很多都涉及到美国企业，这个过程还是非常复杂的。

Nicolas Veron：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政府的参与越少越好。在议会有这样一个提案，如果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的话，我们必须要进行强制的审查。通不过审查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资金，公司可能提出了最高的价格，但是他们必须要理解当地的情况、当地的政治敏感性等等，有时候很多公司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很多中国企业在美国进行了成功的投资，不仅仅只在房地产方面，这涉及到当地的政治和国家的政治，一些州长是非常欢迎中国到那边去投资的。

张立平：刚刚讲的欧盟对中国投资的一些看法，我非常受启发，现在欧盟会不会跟随美国对中国采取一些贸易战的做法？

Nicolas Veron：特朗普总统开始了这样一个破坏 WTO 规则的方法，但欧盟采取的方法是完全与之相反的，我们是更加积极地跟中方进行外贸方面的沟通，也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以及其他国家进行更加积极的对话。这是欧盟所释放的一个信号：我们不想采用美国的方法。尽管欧盟跟中国有着不同的环境，但是我们其实有更多的共同点。在欧洲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保护主义，其实在中国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希望能够在政治方面有更好的开放度，当然在政治方面永远都是存在一些阻力的。你们中国会继续去开放，我们欧洲也是一样，这是非常清楚的。

黄梅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教授）：我

想给绿地的王主任提个问题，你提到你们之前投资比较多的是在发达国家，现在也要往“一带一路”的方向走。你说要响应政府的号召，政府在推动一些企业，政府对你们企业的影响到了什么程度？政府影响的渠道或方式是什么？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国企身份。一方面，绿地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可能受到一些阻碍，很多企业对外投资就是因为国企身份，受了欧美各方面的防范。因为我是做对外援助的，所以我更关注发展中国家，就是非洲和“一带一路”国家。在这些国家投资过程中，最初更多是国企，后面可能是一些中小企业，国企在对“一带一路”或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多对抗风险的能力？谢谢。

王晓东：刚刚我讲到了响应政策的号召，从政策层面来讲，作为中国企业，你做任何事情都一定要符合政策导向，如果你要做的事情跟政策不一致，一般来讲难度就大很多。但从具体的决策层面来讲，我们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这个完全没有政策推动的因素，完全是企业自己的行为。

我们为什么要去柬埔寨和越南？是因为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市场，有好的和不好的方面，那边非常像改革开放刚开始的中国，越南房价水平增长速度非常快。首先这是一个市场决策，还是要看基本面，越南、柬埔寨在基础设施、住房、金融服务方面，确确实实空间很大。政策和政治的因素也不能说忽略不计，这是一个大的导向。但是从微观决策层面来讲我们还是考虑市场因素，一定是这个地方有市场和空间，我们可以比较好地控制风险，这种情况下才会去“一带一路”国家。

第二，我们绿地确确实实不是纯国有企业，不是百分之百国有的，我们是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国有股份现在只占不

到 50%，是相对控股的，我们又是整体上市的公司。我们这种企业去海外投资，更多的身份还是市场化的企业。我们所从事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对这种领域企业的所有制属性的关注度可能不高。高科技企业或带有军事色彩的行业，国有企业的身份可能会成为一个障碍。对于我们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来说，所有制标签的障碍不大，我们到当地履行一些审批的程序，从我们企业来讲，国有的身份影响不大。谢谢！

邵宇：我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美国正在做一个国外投资风险审查的法案，这个法案进程怎么样？会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谢谢。

Nicholas Lardy：我简单来介绍一下。我们之前有一些立法，之后又有了 232 这样一个条款，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使用过这个法案。我们的总统可能在贸易和方面有很大的权利，我们的立法委员会是希望停止给予总统这样的权利。国会希望把这个权利从总统手里撤回，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法案是否会成功的实行，但是我觉得机会很小。

Robert Lawrence：我想补充一点，我们现在的这个环节跟之前是不太一样的，刚刚讲到的 301 条款跟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相关。有一些来自于德克萨斯州的法案也提交到了国会，他们希望能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做一个拓展，现在国家安全的定义是非常狭义的。中国在美国投资的一些领域已经被关闭了。我认为中国肯定会在这个过程中碰到更多的困难，这可能是跟贸易相关的。

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 BIT，但是如果这些领域还是在负面清单上，未来肯定会遇到更多的挑战，也就是说不允许投资的负面清单如果持续增加，那么投资的环境就会变得更

糟，这样 BIT 的通过也会变得更加困难。从长期来看，我觉得 BIT 是解决方案之一，同时 BIT 也是我们技术转移方面的一个解决方案。如果一个外国公司在这个领域不能够全部独资，这样整个投资环境就不是一个自由的市场了，从长期来看对于市场的自由度是很有害的。

赵广彬：我想表达一个意见。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中国企业到欧美去做投资和并购的特别大的案例。前几年有一个案例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反对声音特别大，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当年可口可乐要收购我们的汇源果汁，引起了国内很多人的反对，说这是我们的民族品牌，不应该让外资去控制它。我们的企业在海外投了那么多的项目，国外企业收购我们一个果汁的品牌都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对。我觉得投资是双向的，不仅仅是中国企业对外大规模并购。我们现在谈央企混合所有制，是不是应该也对外国开放呢？在国外企业并购国内企业的时候，在不是特别敏感的领域，我们应该对境外企业更加开放才对。并购和投资是双向的，只有双向才会消除政府和企业的担忧。

胡延照：我也非常赞成大家刚刚的意见，我谈一些感想。中国 40 年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中国人包括我这一代人，对于贫穷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希望发展中国家，希望世界上受苦的人也能够逐步富裕起来。印度尼西亚有 2 亿人口，泰国、越南这一块也有近 2 亿人口，非洲地区有 4 亿多人口，如果这些地区能够像以前的中国一样持续发展起来，全球经济持续增长 20% 是没有问题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有益的。我就从这样的角度上来理解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美国人有资本、有市场、有高新技术，中国有实用技术，

比如说造桥修路，包括跨海大桥、高速公路、高铁，包括房地产以及造医院、造学校，能不能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当然会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我就是简单地希望我们学界能不能够逐步形成一点共识，去影响各自的决策人。这样的话，贸易战就可以适度减少，因为贸易是互利的，极端的摩擦也可以相对减少，这样整个社会的成本不说大幅度降低，至少也有相当可观的降低。这样不就会逐步使这个世界好起来吗？大家共同来阐明这些学理，把这些问题说得更清楚一点，让更多的人理解这一点，就是理解全球化、市场化、自由贸易、优势互补，给人类带来的益处。

谢谢美国的专家提供很好的意见，也谢谢国内的专家提供了很多启示性的意见，包括晓东他们实践的经验，我真的非常希望他们在赚钱的过程中，也能够为当地的发展、为当地的环境提供一点有益的东西，谢谢大家！

Martin Chorzempa：谢谢你刚刚鼓舞人心的鼓励，最后是我们的闭幕致辞。

闭幕式

Nicholas Lardy：闭幕致辞

Nicholas Lardy：我想今天的讨论是卓有成效、卓有成果的。我们今天的讨论涉及到了投资和贸易方面，一开始对潜在的风险做了一些分析，对于贸易中的失衡做了一些分析，美方面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之后我们又听到了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分析。我们今天还听到了有关中国的企业在生产投资、高科技企业投资中所起作用的非常深度的分析。我们这次不仅仅是出于直觉分享了一些内容，而且有很多的实践经验，对中美的经济有了更好、更深的认识。

我也坚信如果美国能够开启这样一个过程，就能避免对双方都带来更多的伤害和损失，我们对消费者和自身造成的损失会远远超越贸易战给中国的企业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我想我们的讨论是卓有成效的。

我们也讨论了中国在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这里我想提一点，中国的海外投资将会继续快速增长。在 2017 年，中国海外投资的量是非常大的，我想对于投资增长的恢复可能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在国外的情况我们也讨论了一下，特别是让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有更多成功的合作。我想从整体来说，这个结果还是非常积极正面的。

乔依德：闭幕致辞

乔依德：我代表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简单讲两句。我也

很同意 Lardy 先生的看法，今天上午的研讨会，既有我们预先准备的演讲者的精彩发言，也有很多嘉宾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对于当前两个重大的问题，一个是中美贸易摩擦，还有一个中国对外投资，都做了很好的交流讨论。通过大家的讨论和提问，至少从我个人来讲，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加深了很多。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由于时间的关系很多问题没有展开深入讨论。比如说，中美摩擦背后的体制问题跟我们的发展可不可以兼容？我们在打贸易战的时候，怎么遵守 WTO 的法则？刚刚我们胡市长也讲到怎么超越这些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会是怎样？我们双方都是民间的智库，以后可以更多地向本国政府提一些建议。刚刚赵广彬的发言，使我想起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既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准则。

最近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的时候，中日双方签订了一个很好的意向，以后在对第三方国家进行投资的时候，中国和日本双方可以合作。就像刚刚胡市长讲到的，中国和美国在解决了当前的问题以后，还可以联起手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更好的投资。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的原因是投资率很高，没有投资，经济增长是上不去的。我们中国有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美国有高科技这方面的能力，大家联起手来对第三方发展中国家投资，既有利于当地的人民，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很有好处。

我们以往跟彼得森研究院一直有来往，今年 4 月我也跟所长见了面。开这个研讨会的起因是去年 9 月份我们开了一个会，会后他们说基金会的会议组织得很好，以后到上海来就跟我们基金会合作。所以今年 4 月份我去美国的时候，

我们就把所有的议程定了下来。我想这只是一个开始，我希望明年还有机会选一个题目在上海再进行深入的讨论。

我一直想我们上海跟北京是不一样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北京是政治决策中心。我们希望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基层、更多的实际操作者来参与讨论，这对彼得森研究院全面了解中国也有好处。虽然上海不是决策中心，但我们上海也走了很多的路，也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可以拿出来。我就总结到这里，会议到此结束。

我代表大家再次感谢演讲者，也感谢大家在今天这么炎热的天气下还来参会。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